



## 回家：論林玉玲的回憶錄

李有成

（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退休）

我現在沒有國家，只有想像。

——沃克特，〈飛行號帆船〉

(Derek Walcott, “The Schooner Flight”)

一、

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曾經以「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一詞形容自己的作品。依照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elix Guattari）的用法，這個用詞所要表達的是「一種『逃離疆域』的形式」（Quayum 85；另參見 Deleuze and Guattari 16-27；Lim 1997: 297）。換句話說，林玉玲的作品所展現的正是這種持續不斷的游移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出現在她的詩作與小說，更可見於她的回憶錄《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她在回憶錄的開頭就這樣寫道：「我來自馬六甲，一個位於赤道以北二度的小鎮，然後我自己搬到新英格蘭，搬到布魯克林，搬到富裕的紐約市郊威爾斯特郡，現在又搬到南加州。我像所有的平凡人一樣，設法擺脫匱乏」(1996: 9; 2001: 46)。<sup>1</sup>《月白的臉》的美國版由女性主義出版社(Feminist Press)在一九九六年出版，同年此書獲頒美國圖書獎。不過一九九七年此書在新加坡印行時，副書名卻被改為「一位娘惹女性主義者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Nyonya Feminist”)。<sup>2</sup>發行此回憶錄的新加坡國際時代圖書出版社(Times Book International)表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讀者對亞裔美國人的看法毫無興趣，他們只對新馬的看法感到興趣」(Chang 7)。此回憶錄的東南亞版副書名因此饒富本土與區域色彩。兩種版本之所以會有不同的副書名當然主要是出於市場的行銷策略，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實也顯示身為離散作家，林玉玲的身分曖昧混雜。

---

<sup>1</sup> 所有引自《月白的臉》的文字都附有兩個頁碼。第一個頁碼指美國版英文原作，第二個頁碼指張瓊惠的中文譯本。因行文需要，部分中文引文會略加修飾，不再另作說明。

<sup>2</sup> 娘惹(nyonya)為馬來語，用來稱呼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出生，且日常生活深受馬來文化影響的華人女性。娘惹會用一種以白米精磨後晾乾的粉餅，也就是馬來語所稱的 badak，調以清水，塗敷在臉上，使整個臉看起來白如圓月。因此林玉玲回憶錄的書名其實指的是娘惹塗粉後的白色圓臉。張錦忠將林玉玲回憶錄的書名譯為《在白色圓臉之間》無疑較符合原意(張錦忠 2003: 198)。為方便中文讀者查閱，本文仍採用張瓊惠的中譯本書名。

林玉玲的離散感性在回憶錄開頭即表露無遺。她這樣敘說自己既非美國人、亦非馬來西亞人的跨界身分：「縱使隱身在美國生涯的點點滴滴當中，生命中非美國的我依然存在，存在於夢中，存在於回返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旅途中，存在於我曾經認識、害怕、摯愛的人身上，我為了到美國功成名就而離棄他們，在我對他們綿綿不斷的情感的暗流裡，形成了與美國平行的另一個世界」（9-10; 46）。林玉玲顯然強烈感受到自己的身分恆處於一種「既非一亦非」（*neither-nor*）、介於其中的懸置狀態，她的回憶錄因此是一部移民與離散的文本。弔詭的是，正因為身處這樣的去疆域化的情境，林玉玲才能夠體會自己的邊界身分，並創作出一種邊界書寫（*border writing*）。錢柏斯（*Ian Chambers*）曾經這樣描述邊界情境：「一腳踩在這邊，另一腳卻永遠踩在別處，橫跨在疆界的兩邊」（17）。對林玉玲的身分處境而言，這個說法既貼切而又傳神。這樣的處境也與離散文學的尷尬命運若合符節。林玉玲就曾經這麼指出：「基於非文學的、意識形態的及政治的因素，那些被視為離散的作品通常無法進入美國文學的群體中。儘管移民與離散作品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世界主義的或都會的文學作品有重疊之處，這些作品仍被排除在美國文學的典律之外」（*Lim 1997: 290*）。

《月白的臉》一書大致可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分敘述林玉玲所經歷的馬來亞殖民時期與馬來西亞獨立後的成長過程，她如何在貧窮、家暴及父母的離異中度過童年與少女時期；第二部分記錄她的移民經驗，先是負笈美國，然後在美國取得教職並結婚

生子。林玉玲後來在分析她的回憶錄時，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說：

雖然我的回憶錄主要被當作貫穿至少兩個主體——一個是馬來西亞華人，一個是亞裔美國人——的美國族裔回憶錄來讀，其實這個回憶錄是跨國的。由於馬來西亞和美國擁有差異很大的政治憲法與政府和意識形態結構，在這些結構裡，馬來西亞華人和華裔美國人的身分是處於邊陲的，同時由於在時間上自傳主體置身於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體與權利當中，這本書事實上包含了兩個回憶錄，馬來西亞華人遭到否定的公民權論述與美國外僑失去族裔社群的動力在這兩個回憶錄中相互磨擦。(Lim 2007: 37)

我們從回憶錄中知道，林玉玲二十四歲時離開馬來西亞，那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馬來西亞的種族暴動事件後的幾個月。五一三事件在馬來西亞的歷史上至今仍是一個充滿創傷的集體記憶。林玉玲在回憶錄中提到：「五一三事件之後，馬來西亞大多數的事物，不管是公共事務或是家庭內務，不管是政府機關或是私人企業，不管是專業或是個人，經濟或是文學，全都無可避免地蒙上種族的色彩，這些狀況恐怕至今依舊」(137; 226)。<sup>3</sup>她繼續說道：

---

<sup>3</sup> 五一三種族暴動之後，以英文創作的文學處境蕭條慘澹。許泰安 (Tai Ann Koh) 曾經指出：「一九六九年五一三種族暴動後，馬來人民族主義者趨於強硬，結果在一片呼聲中要求以馬來文書寫的作品才能稱為國家文學，因為馬來語 (另稱 Bahasa Malaysia) 是國定語言。這樣的邏輯是：馬來西亞境內以其他語言所創作的文學僅能被視為次要的『地方性』文學。英文文學因此日趨頹萎，放眼望去沒有任何新一代的英文作者；就我所知，曾有一段時間，

「新聞報導被審查，報紙評論與分析被封鎖，政府緊接着修改國會條文以確保馬來人的宰制地位，這一切正好證實了我們的憂懼」（137; 226）。林玉玲就在這種備受壓迫與沮喪的情境下離開那個她稱之為家鄉的馬來西亞。「除非是以一個過客的眼光，否則我再也不會見到馬來西亞」（138; 227），她說。

五一三暴動以及隨後發生的事件，不僅在政治與文化意義上對林玉玲的生命歷程造成衝擊，帶來轉折，更是驅使她在三十年後撰寫回憶錄的主要動力。在接受張瓊惠訪談時，她被問到寫作《月白的臉》的動機，她的回答非常直接：

我主要的動機是想寫下華人的馬來西亞（聽起來似乎報復心切），這樣馬來西亞的華人以後才會了解過去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目前所實施的種族配額制度是個極度不公不義的制度，簡直是將華人貶為次等公民。有些馬來西亞華人已經接受自己不算是真正馬來西亞人這樣的想法。我寫回憶錄的原因，就是要讓華人知道他們已在馬來西亞定居了數個世代，他們跟馬來人一樣，都是馬來西亞公民，他們沒有必要忍受那樣的不公不義。（Chang 4）<sup>4</sup>

---

完全沒出現過一位能在四十歲前成名，且以英文寫作的馬來西亞作家」（211）。

<sup>4</sup> 五一三事件後，政府若干倒行逆施的做法使得林玉玲早期的自我認知完全破滅。在與胡迪（Timothy Fox）的訪談中，她說道：「在馬來西亞的青年時期，我的確想像自己參與那個民族主義蓬勃的後獨立運動，那真是個後殖民歷史性的一刻」（Fox 2000）。林玉玲提及的種族配額制度其實是一種政治安

換言之，林玉玲有意以她的回憶錄寫下她對原鄉的幻滅感，並以她個人的故事顛覆由強勢種族與國家機器所主導的國族敘事。這一點正好說明了離散的批判意義，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只有在離散的狀態下林玉玲才能進行其批判計畫。這是在別的地方借用阿巴杜萊（Arjun Appadurai）的話所說的離散公共領域（李有成 2010：169-170；2010a：29-30），林玉玲透過這樣的公共領域，不斷與她生長的家國表示異議與抗爭。她把她的回憶錄歸類為生命書寫，與她所謂的自我書寫（self-writing）大異其趣，用她自己的話說，「作家如果自視為某個集體——國民、種族，或任何方面都屬弱勢者（族裔、少數分子、女性、身障者等等）——的一分子，勢必很難書寫肖像型的自傳，把整個敘事縮減為只是個人的個性，也就是自我書寫。相反的是，我們所說的生命書寫必然會採用與自傳相關、卻又有所區隔的文類型態：歷史、實錄、日記、散文，甚至詩。」在這樣的生命書寫中，個人的「個性」將「成為更大的紛擾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結構與力量的一部分」（Lim, 2007: 24）。這樣的體認清楚點出了《月白的臉》一書的屬性。

## 二、

《月白的臉》第一部分所敘述的是林玉玲所謂的第一個人生。

---

排，政府透過立法，排除或限制少數族裔（以華人與印度人為主）享用國家資源，以保障強勢族群——籠統稱為土著或土地之子（Bumiputra），其實主要為馬來人——的特權。

她出生於馬來半島南方的馬六甲，當時正值英國的殖民時期，她成長的時候馬來西亞已經獨立建國——先是馬來亞，後來擴大為馬來西亞。擴大後的馬來西亞領土包括馬來半島、沙巴、沙撈越與新加坡，然而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被迫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林玉玲的父親是一位當地人所說的峇峇（baba），母親則是娘惹（nyonya），是屬於所謂海峽華人（Straits-born Chinese），林玉玲因此是典型的土生華人（peranakan）。依洪宜安（Ien Ang）的說法，「海峽華人」一詞中的「華人」意義「總是有那麼一點點曖昧難明」（Ang 26）。不過大體而言，海峽華人對這樣的曖昧稱謂非但不以為意，可能還引以為傲，因為在英國殖民時期，海峽華人一出生便是法定的英國子民；更重要的是，林玉玲也這麼說：「海峽華人是（華人中的）少數」（36; 81）。據洪宜安的解釋，土生華人「多半不具有那些在其他華人身上可以辨識的文化特色，特別在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衣著及語言方面。多數的土生華人早就無法流利使用華語，他們講的實際上是一種專屬他們的馬來語，顯示他們或多或少與當地馬來人有密切的混雜」（Ang 26）。不過我也必須指出，某些土生華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見洪宜安所說的「族裔的自然主義」（ethnic naturalism）。他們依然遵行許多中國人的傳統風俗習慣，包括祭祖與民俗宗教等。洪宜安因此認為土生華人的身分是「一種全然混雜的身分」（27）。

林玉玲來自一個深受殖民文化與西化影響的家庭。她跟其他兄弟一樣，六歲上英國人辦的小學，開始學習英語。林玉玲表示，她講英文「就像雨滴重回河川，魚兒重回江海」（11; 48）。小學畢

業後她進入天主教的修道院女校。林玉玲的父親一向嚮往西方事物，喜愛英語流行歌曲，也訂閱英文雜誌，如《讀者文摘》、《國家地理雜誌》，以及各種電影畫報：「爸爸不務正業，在儒家思想把關的社會中長大，卻一心追求西方的流行文化」（36; 181）。前面提到，當英國仍然統治着三州府（或稱「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包括馬六甲、檳城與新加坡）時，林玉玲一家早就已經是英國屬民。林玉玲後來卻嚴厲批判她年輕時所接受的教育。在回憶錄中她以後殖民的語氣指出：「西方世界以強力的政治宰制來改變社會，不管我們稱這些力量為意識形態顛覆或是文化殖民，對我而言，這一切始於一首簡單的、古老的英語民謠」（64; 119）。林玉玲提到的民謠，是她從哥哥學校課本中背誦下來的，歌名叫〈快樂的磨坊主人〉（“*The Jolly Miller*”）。《月白的臉》一書其實處處可見類似的後殖民批判。林玉玲回憶說：「回想過去在英國殖民教育的文化帝國主義之下，在早熟的孩童與年輕人身上，就這樣失去了未來的馬來西亞的知識分子，此事想來令人扼腕」（87; 152）。林玉玲譴責殖民教育所帶來的可怕後果，她不禁嘆道：「〔殖民〕教育必經的錘鍊過程往往只能造就聽話的行政人員，冷漠無情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只是殖民者的傳聲筒罷了。殖民教育只會製造居中穿梭走動的人，而無法造就領導者，他們只不過是一群擅於聽命與傳令的怪人。這樣的教育只是教人服從，不是教人反抗。只有每個人都守法守分，這樣的教育才能延續下去」（88; 152-153）。換句話說，英國的殖民教育宰制主要是為了讓殖民體系能夠不斷製造被殖民的個體，其功能在於協助管理帝國的殖民財富，

確保帝國殖民的有效統治。這是個全面而完整的宰制過程，將被殖民者形塑成奈波爾(V. S. Naipaul)所謂的「學舌人」(the mimic)，剝奪其文化信心，使之無法恢復自信(65; 120)。

有論者認為，林玉玲的回憶錄講述的基本上是「一部異鄉人的故事」(Yu 107)。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林玉玲的前半生涉及她從英國臣民轉變為馬來西亞公民的過程。對殖民時代的馬來亞社會與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大抵都會同意，那些從小學習英語、掌握一定英語能力的人，不論在馬來亞獨立前，或在獨立後初期，都是社會與政治上的優勢分子。他們屬於菁英階級，在社會、政治及經濟上享有更多更好的機會，這是其他未受英語教育的人所望塵莫及的。這也說明了，當時何以會有許多華人（還有印度人）要「將自己對於國家的歸屬感投射在孩子的英式教育上。這些受英式教育的人，將來個個會成為教師、護士、大夫、牙醫、法院職員，以及政府要員，在國家的統治基層中擔任重要的職務」(87; 152)。這樣的情況在馬來西亞獨立後的十年間幾乎沒有多大改變，林玉玲也在回憶錄中這麼回顧：「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或許到一九六九年五一三種族暴動事件發生之前，馬來亞的教育結構仍屬英國殖民的教育結構」(68; 125)。林玉玲雖然是殖民教育下的受益者，但她後來對此高度階層化的壓迫性教育體制頗多省思：

殖民教育對兒童的戕害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每一個關卡都會有一些人遭到淘汰。十一歲的時候，有些女孩就得回到橡膠園去幫父母做事；有些人到了十四歲才被刷下來，去當護士助理或店員；要是十六、七歲才被淘汰，有些人就

去念師訓學院，以後在小學工作；還有更多人索性結婚，或是待在家裡等着嫁人。一九五一年在馬六甲，一共有數千名六、七歲的孩子進入公立小學，經過多年的考試屠殺，大約只有六十個學生可以倖存，進入文科或理科就讀大學預科第一年；而六十個人裡面，或許只有十五個人可以在一九六四年成為馬來亞大學的學生。(84; 148)

熬過了競爭激烈的人學考試，林玉玲終於成為那十五個幸運兒中的一位。她的回憶錄有一部分敘述她在馬來亞大學的生活。一九六四年，她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馬來亞大學，此時的馬來西亞已經是個獨立七年的年輕國家。在這七年當中，整個國家有意識地進行去殖民的運動，林玉玲親眼目睹「馬來西亞人這個新的人民」(121; 201)的誕生。以馬來亞大學的英文系為例，有史以來第一次由馬來西亞人擔任系主任。顯然「新政府已經決意讓一些本土的教授取代由英國人掌權的職位，因此，系主任的拔擢任用正好反映了馬來亞社會正由被殖民文化轉型到國族文化」(120; 199)。一九六九年的種族暴動進一步讓強勢種族藉機將馬來人民族主義確立為國家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因殖民遺緒而制定的英文優先的政策也在一夕之間改弦更張，取而代之的是馬來文優先的國家語文政策。

五一三事件之後，林玉玲離開馬來西亞遠赴美國；當時舉國的政治氣氛肅殺而令人窒息，因此她是帶着絕望的心情離鄉去國的。林玉玲對政府處理文化與教育的方式頗多微詞，她認為政府的許多作法都充滿了種族歧視。她說：「馬來西亞的暴動仍然餘波

蕩漾，文化褊狹最令我深惡痛絕，其中包括以種族為基礎的配額制度、黨派政治，以及出於種族本質的文化分離政策等」（183; 296）。林玉玲提到，以英文、華文或坦米爾文創作的文學，都不會被承認為國家文學的一支，只因為所謂的國家文學僅限於以國語——即馬來文（或稱 *Bahasa Kebangsaan*）——完成的作品。<sup>5</sup>馬來文優先的政策其實對其他種族語言的發展非常不利；這樣的政策非但無法確保其他族群的文化，對他們的文化公民權造成很大的傷害。換言之，這些族群無法「透過教育、習俗、語言與宗教來實踐其文化的保存與發展」（Miller 231）。對林玉玲而言，當時馬來西亞語文政策的轉向其實徹底改變了她的世界；曾經熟悉而安穩的一切，如今變得錯置失序，她無法確定自己是否仍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她逐漸發現自己已經淪為文化上的流放者。

回憶錄的第二部分除了回顧林玉玲在布蘭岱斯大學的研究生涯外，還敘述她與查禮士（Charles）結婚生子，以及她如何在紐約附近的許多學院任教，之後又轉往一間研究型大學教書的經過。回憶錄結束時，林玉玲以感人的語氣省思家園對她的意義：

我放棄掙扎，不再守着記憶中的家園不放，這大概是我所能做到的最仁慈寬厚的一件事了。在美國不管住在哪裡——波士頓、布魯克林、威闕斯特——我總不知身在何處，只覺得自己並不在美國。這種感覺就是母親教給我的故事，也就是她所屬的馬六甲移民的土生華人的故事。然而，

---

<sup>5</sup> 有關馬來西亞國家文學的論述與批評，請參考張錦忠（111-25）。

或許她也教給了我：家就是我們把故事說出來的地方。倘若我有更多的時間與母親談話，也許我就會在傾聽她的故事中學會寬恕。在加州，我開始寫有關美國的故事，也寫馬來西亞的故事。傾聽，然後說出我自己的故事，我正在回家的路上。(231-232; 365)

寫作回憶錄是林玉玲連結過去的方式，同時也是她必須踏出的重要的一步，她因此踏上旅程，重新思構家園的意義。

### 三、

林玉玲的身分認同歷經不同階段的轉變。在馬來亞殖民時期她是英國的子民；殖民主撤退後，她自動成為馬來（西）亞公民，變成馬來西亞華人。隨後在一九八〇年的情人節那一天，也就是她懷胎四個月時，她宣誓歸化為美國公民，最後成為亞裔美國人。對於這一連串的蛻變與轉化，林玉玲在回憶錄中總結道：「我自己的國家拒絕讓我這樣的人把那裡當作家鄉，諷刺的是，在美國這個原本禁止像我這樣的人進入的土地上，我發現自己在這裡建立了家園。雖然美國還有許多令人不快的歧視事件發生，然而在意識形態上，馬來西亞將來很有可能變成另一個美國」（230; 363）。

林玉玲是歷經一番波折之後才對美國產生歸屬感的。在美國初來乍到的頭幾年，她一直飽受身為外國人的困擾，這個陰影揮之不去，讓她強烈感受到「身為外僑的異常苦楚」（160; 262）。她說：

不像那些興高采烈的移民，他們視美國為面積寬闊的不動產廣告，未來近在眼前，待價而沽；她以登記在案的外僑身分進入這個國家卻無所適從。她無親無故，居無定所，無所歸屬，她從當地居民的眼光裡看到自己：客人、陌生人、局外人、不合時宜的人、乞討的人。(160; 262)

林玉玲此處所謂的「登記在案的外僑」，正好屬於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說的「後殖民的殘餘人物」。史碧娃克認為，外僑「似乎挑戰了當代以人口學界定虛擬疆界的趨勢」（47）。林玉玲以這樣一個後殖民他者的身分，遊走於國族國家所劃定的協商空間中。再用史碧娃克的話說，林玉玲在這個協商空間裡「願意擱置其公民權利」（48），四海為家，可是身為外國僑民，她也不只一次清楚認定自己是位外來的陌生人：「她開始在一個陌生人的身體中感到舒適自在。……她開始忘記不是陌生人的感覺」（160; 262）。

身體的概念與對身體的感覺是《月白的臉》一書中相當重要的議題，林玉玲不僅在這裡回憶其初到美國時如何安置其陌生人的身體，回憶錄中也用了不少篇幅記述她童年時代因父親多次對她身體施以暴力懲罰所造成的羞恥感，這一切形塑了她所說的「對自我的內在意識」，也就是那種「私密的、個人化的、令人傷痛的感性」，塑造了她稱之為記憶的「非自願性精神意象的內容」。林玉玲後來在談到《月白的臉》一書的寫作時，曾經這樣表示：「在回述我的人生時，貫穿我的童年到身為人母之間的線路的，是我的身體如何成為我的想像的管道。我的身體本身充滿憤怒與粗暴，

既是違逆與暴力的客體，受制於違逆與暴力，也是強制他人接受的粗野的行為」(Lim 2007: 25)。

陌生人的感覺在《月白的臉》一書中無所不在。在布蘭岱斯大學的日子裡，林玉玲經常在午後到波士頓公立圖書館，而且往往一待便是好幾個小時，她大量閱讀關於異形或外星人的科幻小說：「這些書寫的全是外星人、外星、外星制度、外星語言、外星關係，以及與此有關的危險、風險、威脅、災難等」(154; 253)。林玉玲迷惑於莎拉·阿默德 (Sara Ahmed) 所說的「未知的危險」(2)，沉湎於科幻小說，並將閱讀經驗投射到自己的世界。在一個陌生且充滿敵意的國度裡，她自視為異形，為外星人，她的生活與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充滿挫折。據莎拉·阿默德在她的《怪異的接觸：後殖民性中的他者》(*Strange Encounters: 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一書的觀察，文化生產中對於異形的過度再現在在顯示「異形是我們的綺想與慾望的來源」。更重要的是，異形「不屬於任何國家領域，法律已界定了異形身分。異形只是〔我們〕對某個特定的公民或主體社群的一個類別：異形作為內部的外來者，具有空間區隔的功能，同時在家(園)內建立遠近親疏的關係」(Ahmed 2-3)。換句話說，異形作為我們的客人——即接受我們招待的主體——確認了我們身為主人的身分，同時也確立了我們所監管的「可知疆域與可居範圍」(3)。林玉玲對外星異形的綺想迷戀無疑反映了她身為陌生人的感受，她游移在邊界之間，其身分狀態懸而未決。

這種陌生人的感受在林玉玲的第二個人生中始終徘徊不去。

當她自視為陌生人時，她早就已預設跨越疆界的必然性。陌生人在不斷游移的狀態中，國籍的概念不免受到挑戰。林玉玲認為自己是個失去國家的人，是個「沒有國家的詩人」(187; 301)。她每天過日子，但不覺得存在：「她好比倒臥在地鐵階梯上的醉鬼，身如遊魂，在這國家兩億五千萬人口中輕如雲煙」(160; 262)。陌生人卻也對國族國家所建構的邊界意識造成干擾，因為陌生人身處的空間其實是一種離散空間，就像林玉玲所指出的，「離散論述是鬆動身分與臍帶和國族根源連接關係的論述」(1997: 297)。

《月白的臉》是個極具批判性的文本。林玉玲對她的母國所採取的具有種族歧視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措施絲毫不假辭色。傳統的公民權——尤其是政治與經濟上的公民權——顯然已不足以保障公民的文化與知識權利，因此必須仰賴新的文化公民權。廣義而言，文化公民權的重要性在於其所建立的離散典範，在策略上不斷質疑與顛覆國族國家的文化霸權，也就是「以文化表現來爭取公共權利與承認，同時強調公民權與文化之間的互動」(Rosaldo 259)。洪宜安即曾指出：「基本上，離散族群的範圍必然是跨國的，總是連接在地與全球、此處與他處、過去與現在；對於牢牢根植於地理與歷史的『國族文化』或『國族認同』，離散族群具有潛力動搖這些靜態的、本質的與極權的觀念」(Ang 34-35)。

我想指出的是，《月白的臉》其實是一個饒富「批判性離散文化政治」的文本。以洪宜安的話來說，這個文本「不以褒揚異地來貶抑（真實的或想像的）家鄉，反而準確地在『我來自何方』

與『我歸向何處』之間維繫着創造性的緊張關係」(Ang 35)。林玉玲對國族歸屬同時採取「既是一亦是」兩者皆是 (both-and) 與「既非一亦非」兩者皆非的態度，因此她的回憶錄可以輕易被納入我們現在所稱的離散文學或世界文學的大家庭中。林玉玲的過去受到兩個政治與文化實體——馬來西亞與美國——的影響，再加上她生命中的離散經驗，她在身分認同上形成分裂，她的回憶錄因此在在顛覆了家園與歸屬的意義。霍爾 (Stuart Hall) 曾經提醒我們，應該避免以「本質或純粹性」的論調來界定離散經驗；相反地，我們必須承認離散經驗「異質與多元的必然性」，並認知到以差異的認同與混雜性界定離散經驗的重要性。霍爾進一步強調：「離散身分透過轉化與差異，不斷生產與再生產新的身分」(235)。霍爾的說法一針見血，可以幫助我們面對像《月白的臉》這樣的一個離散文本。

林玉玲在回憶錄中還提到一個插曲，讓她領悟到自己其實很早就是一位文學的流放者。一九八〇年，她的詩集《跨越半島》(*Crossing the Peninsula*) 榮獲大英國協詩創作獎 (Commonwealth Prize for Poetry)，她獲邀到倫敦接受頒獎。她那時初為人母，需要親自哺乳，其實壓根兒無暇處理出國的事，出版社的總編輯卻告訴她說，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大概無法贊助她往返倫敦的機票，主要的原因竟是：「馬來西亞對英文創作頗有難色」(187; 301)。林玉玲寫道：「直到那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既然只有以馬來文創作的作品才能算是國家文學，我的書恐怕不會為官方所接受。」她不禁嘆道：「沒有國家的詩人，這是件多麼奇怪的事！」(187;

301) 這個插曲說明了，林玉玲早在《月白的臉》出版之前就已經是個離散作家。本質上她所生產的是「無家可歸」的作品——不屬於任何國家文學的作品，等於是沒有主人的客人。正因為她的詩集不為她的國家所認可，林玉玲獲頒大英國協文學獎可說極具象徵意義。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她的回憶錄：回憶錄除了市場考量而需要兩種不同的副書名外，這樣的作法卻也勾勒出作者分裂的身分認同——一個她亟待安頓的身分認同。

#### 四、

林玉玲曾經在〈移民與離散〉(“Immigration and Diaspora”)一文中借用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二元概念——血緣聯繫(filiation)與聚合聯繫(affiliation)——來建構文學生產的離散典範。薩依德在提到他所揭櫫的世俗批評時，特別強調現代文化與歷史中血緣聯繫與聚合聯繫的關係。他以生物的觀點指出：「現代生活枯燥、耗費、了無生氣，血緣聯繫至少是個非理性的選擇，頂多也是個難以達成的選擇。……其他的選擇似乎由機構、社團與社群所提供的社會存在形成聚合聯繫，而非由生物所保證」(Said 17)。薩依德認為聚合聯繫「是一種補償性的秩序，……不論政黨、機構、文化、信念，乃至於世界觀，這種補償性的秩序為男男女女提供了一種新的關係形式」(19)。血緣聯繫則與聚合聯繫不同，「屬於自然與『生命』的範疇」；相反地，聚合聯繫是一種選擇的身分認同，「專屬於文化與社會」(20)。

林玉玲認為薩依德的二元分類有隱喻上的重要性與契合性；在她看來，薩依德的二元模式其實「含納流放者與離散者的眾多歷史概念」（1997: 296）。離散狀態代表一種被剝奪與家園在血緣上聯繫的狀態。離散者所能擁有的是後天選擇的、社會聚合式的家園，這樣的家園與同化未必相同。在《月白的臉》臨結束前，林玉玲嘗試協調過去與現在，企圖與記憶中那個拒絕她的家園和解，而且對她兒子在美國的未來充滿憧憬與希望，這一切顯然無不充滿離散的存在意義。林玉玲在回憶錄的結尾表示，透過回憶錄與他人的故事，她正邁向回家的路上。如果我們認同薩依德的說法：「血緣聯繫衍生聚合聯繫」（Said 23），那麼林玉玲隱喻式的返鄉之行可以說是她重新連結血緣屬性與其離散屬性的過程，她終於踏上了朝向和解與寬恕的旅程——回家。

## 引用書目

- Ahmed, Sara. *Strange Encounters: 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Ang, Ien.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Chambers, Iain. *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Chang, Joan. "Shirley Geok-lin Lim and her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New Literature Review* 3:5 (Summer, 1999): 1-13.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and Guattari. *Kafka: Towards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 30. Indian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 1986.
- Fox, Timothy. "Just Another Cell in the Beehive: Interview with Shirley Geok-lin Lim, Feminist Scholar, Teacher and Poet." *Intersections* 4 (September, 2000). [http://www.she.murdoc.edu.au/intersections/issue4/tim\\_fox\\_interview.html](http://www.she.murdoc.edu.au/intersections/issue4/tim_fox_interview.html). Retrieved August 12, 2005.
-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222-237.
- Koh, Tai Ann. "Dispossession, Possession and Domestication: Literature in English by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Ling-chi Wang and Gungwu Wang,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Vol. 1. Singapore: Eastern UP, 2003. 196-223.
- Lim, Shirley Geok-lin. "Academic and Other Memoirs: Memory, Poetry, and the Body." Rocío G. Davis, Jaume Aurell, and Ana Beatriz Delgado, eds. *Ethnic Life Writing and Histories: Genre, Performance, and Culture*. Contribut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Vol. 4. Berlin: Lit Verlag, 2007. 22-39.

Lim, Shirley Geok-lin. "Immigration and Diaspora." King-Kok Cheung, ed. *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7. 289-311.

Lim, Shirley Geok-lin.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 1996.

Miller, Toby. "Cultural Citizenship." Engin F. Isin and Bryan Turner, eds. *Handbook of Citizenship Studies*. London: SAGE Pub., 2003. 231-244.

Quayum, Mohammed A. "Shirley Geok-lin Lim: An Interview." *MELUS* 28:4 (Winter, 2003): 83-100.

Rosaldo, Renato. "Cultural Citizenship, Inequal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Rodolfo D. Torres, Louis F. Mirón, and Jonathan Xavier Inda, eds. *Race,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A Reader*. Oxford and Malden, MA: Blackwell, 1999. 253-261.

Said, Edward W.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3.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Resident Alien." David Theo Goldberg and Ato Quayson, eds. *Relocating Postcolonialism*. London: Blackwell, 2002. 47-65.

Yu, Teresa. "Review of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Pacific Affairs* 70:1 (1997).

李有成。〈緒論：離散與家國想像〉。李有成與張錦忠合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2010a。

7-45。

李有成。〈離散與家國〉。李有成與馮品佳合編。《管見之外：文學與影像文化研究——周英雄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書林，2010。149-182。

林玉玲。《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張瓊惠譯。台北：麥田，2001。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2003。

[ 原發表：2010；校訂：2023 ]

